

著名作家、翻译家

# 杨绛先生安静地走了

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(记者姜波、施雨岑)记者25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(笔名:杨绛)先生,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。

杨绛,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,本名杨季康,是家中第四个女儿。1928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,后转至清华大学借读。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,同年夏季一起赴英国、法国留学。回国后,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;1953年,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。

杨绛先生早年创作剧本《称心如意》《弄假成真》《游戏人间》等,被多次搬上舞台。来到社科院后,她翻译了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《堂吉诃德》等多部高水平的译作,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。杨绛先生一生创作不竭,著作丰厚。1980年,她发表了长篇小说《洗澡》;1981年发表《干校六记》并被译成多种语言;1984年作品《老王》入选初中教材;1985年散文集《隐身衣》英译本出版。2003年,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,风靡海内外;2007年,再出版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,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据悉,2001年,钱钟书、杨绛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,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截至2016年,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,惠及学子上千人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25日对新华社记者说:“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,不惊扰大家,不麻烦大家。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,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。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,和她挚爱的丈夫、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。”

5月25日凌晨,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。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、正直敦厚,正如她评价自己译作《吉尔·布拉斯》的著者勒萨日一样:“一身傲骨,不肯迎合风气,不肯依附贵人。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,不怕得罪当道。他不求名位,一生只靠写作谋生。”

**A**

**论做人:**  
**努力做一个**  
**不媚上、不欺下**  
**谨守忠恕之道的**  
**正直诚恳的人**

杨绛先生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,取名杨季康,是家中第四个女儿。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、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,刚正不阿,浩然正气,对她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。杨绛曾说:“在我的一生中,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、不欺下,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”。读大学第二年分科时,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科,她征求父亲的意见,父亲说,最喜欢什么,就学什么。她不放心:“我喜欢文学,就学文学吗?爱读小说,就学小说?”父亲说,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,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在父亲的指导下,她始终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,在文理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文科。学成后杨绛毕生从事创作和翻译,这也离不开父亲曾经的熏陶,因为父亲对她说:“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,不如翻译些国外有价值的作品。”还说:“翻译大有可为。”



2001年9月7日,杨绛在北京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,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签订协议后,校方向杨绛女士赠送纪念品。  
新华社记者 王呈选 摄

## 杨绛小传

### B 论读书:学得失意勿灰心,得意勿忘形

杨绛先生从小热爱文学,一星期不看书,就觉得“一星期都白活了”。哪怕文革的时候被批判“读书追求精神享受”,也从未让她放下书本。杨绛先生觉得读书好比“隐身”的串门:“要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,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,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,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;而且可以经常来,时刻去,如果不得要领,还可以不辞而别,或另找高明

跟对他质。还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,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。如果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,不妨抽身退场,甚至砰一声关上大门,就是说合上书,谁也不会嗔怪。经常在书里‘串门儿’,可得到丰富的阅历,可以认识各时各地、多种多样的人。读书如阅世,多读书可以变得更聪明更成熟,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,也可学得失意勿灰心,得意勿忘形。”

### C 谈创作: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

在对文学的热爱中,杨绛自己也提笔创作,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各种人物,长篇小说《洗澡》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惯见的“嘴脸”。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幽默,又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。不过,杨绛常说:“我不是专业作家,只是一个业余作者。我写的小说,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,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。”常常有读者把杨绛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,但杨绛认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,“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,想象就是这个火所发的光;没有火就没有光,但光所照及,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。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”。她的先生钱钟书

就曾推许她写小说能“无中生有”。有人曾评价杨绛先生的小说靠点滴人事映照人生真相,笔触风趣幽默,带有喜剧色彩,令人想到奥斯丁的小说;而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戏剧《称心如意》《弄真成假》登上剧坛后,也被誉为是“喜剧的双璧”。这些剧作以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描摹世态百相,善开玩笑又不尖酸刻薄,幽默之处不失温情敦厚,而且,隐藏在幽默和嘲讽背后的是深深的严肃和悲哀,让人联想到她翻译的几部作品:《小癞子》《吉尔·布拉斯》和《堂吉诃德》。正如她父亲让她学习自己“性相近”的专业,她在从事翻译的时候,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描写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。



这是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。  
新华社发

## 追忆杨绛先生

享年105岁

新华时评

### 向上之气润人于斯

一时间,不同职业、不同年龄的人开始转发着吊唁文字,杨绛先生病逝的消息传遍了朋友圈。新时代的媒介传播着亘古不变的主题,述说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独特魅力,以及她给人带来的力量。

阅读的力量。人们所熟知的杨绛先生,直接来源于其在文化上的地位,作为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,用几近百年的才学,演绎着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文化涵养,用一部部的作品,一篇篇文章,把国事、家事娓娓道来。平平淡淡的文字,传递着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,温暖着越来越多的心灵。

品格的力量。命运曲折,塑造了杨绛先生传奇的一生,让众人敬仰的,是这一生中始终充盈的向上之气。对文化的信仰,对人性的信赖,塑造了她坚韧的生活信念、从容的生活态度。我们看到,杨绛先生虽经历坎坷却无怨无悔,始终用向上精神感染众人。

家庭的力量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,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。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,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,注重家庭,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点。杨绛先生的家庭纪事散文《我们仨》,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对家庭真挚隽永的感情,深深打动了成千上万读者。

最贤的妻子,最才的女。人生终究离不开老病兴灭,但如水的力量可以流淌远不止百年。这本人生大书,犹如与众人站在一起的木棉,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,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,滋润斯人,更滋润着一代代后来人。在一份淡定从容的人生答卷里,以滴水穿石的力量,平和地迎接每一天,过好每一天。

(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)

她才华横溢,著作等身,一百岁后仍笔耕不辍,从容蕴藉;她乐观坚强,正直敦厚,把自己看得很“小”,却时时心念国家社会。

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,105岁的杨绛与世长辞,先生却希望: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,不惊扰大家,不麻烦大家。

纵然斯人已逝,而她的精神和作品,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。

一位把自己看得很“小”的大家

“每到生日这天,杨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望,她常和我们说,你们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了……”25日凌晨一直守在医院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声音嘶哑、难掩悲伤。

“她这一生,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、做学问,最怕给别人添麻烦。”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点滴,陈众议感慨万千。

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,她的听力已非常不好。每当有人去拜访,她就只能用“笔谈”的方式交流,非常劳累。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,为此还专门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。

但是,先生婉言谢绝了。开始,大家猜测她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,又联系专家能否上门为她服务。然而,这些并没有让先生改变决定。在众人的再劝说下,她说出了真实原因:“我年纪大了,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?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有需要的年轻人吧!”

“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,从不昧着良心做事,从不伤害别人,低调地生活。包括去世这件事,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,不惊扰大家,不麻烦大家。先生心里,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,把他人和社会看得很大。”陈众议说。

一位“点石成金”的翻译家

“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,对中国文学也很精通,可谓中西贯通,一般人难以企及。”在“专心做学问”的先生面前,年逾古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、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“很崇拜她”的“年轻后辈”。

杨绛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,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。她常说,翻译是件苦差事,译者“一仆二主”,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。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,另一个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……“我作为译者,对‘洋主子’尽责,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。”

“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,写成《试谈翻译》(后改写成《翻译的技巧》)一文,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。”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说,“先生创造出‘翻译度’这一术语,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;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,在翻译西方语句的长复合句时,必须把原句拆开,按照各成分的主次、从属关系,用地道的汉语,重新组合,不能有所遗漏,也不能增添。内容不可增删,语气不可走样,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……”

“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,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。”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,“她的文笔好,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,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,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,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。”

薛鸿时曾在《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》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、点石成金的故事:“有一回,《世界文学》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。我译成后没有把握,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。杨先生欣然同意,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,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……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。文章发表后,我接到素不相识的《作家》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,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‘极大的艺术享受’,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,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”

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

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,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“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‘早就商量好的约定’。”薛鸿时告诉记者,“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,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,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,帮助他们完成学业。”

对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钱、杨两位先生身边做“助手”的薛鸿时而言,追忆杨绛先生,是件令他心痛的事。“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,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。”

“据我所亲见,他们处处节俭,自奉至薄,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,一张纸,连背面还要用一次。玻璃罐头瓶,洗净了重复用。记得有一次,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,供他们腌制咸菜。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,往往捉襟见肘,但每逢春节,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……而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。”薛鸿时说。

年过百岁后,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,还时时以祖国命运为念。

薛鸿时回忆:“有一次,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,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。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《说俭》给我看,文章说,‘世人皆言文明增进,生活之程度亦增高……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,当先求人格之增高’,决不能‘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’。”

“杨绛先生对我说,‘社会风气奢靡,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、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。这篇近百年前所写的文章,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。’”薛鸿时说。

(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)